

“三观标签”矮化了文艺作品内在价值

■ 玉渊杂谭

杨 仑

最近,“三观”成了网络短评和弹幕里很流行的一个词。在豆瓣、b站等网站浏览文艺作品条目,你会发现,原来包法利夫人是爱慕虚荣的白富美;《红与黑》描写了一个凤凰男的故事;《红楼梦》中的晴雯不是反抗者形象,而是“作女”的典型代表……

如果这仅限于互联网次级文化当中,倒也无关痛痒;问题是,三观正不正,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用

户当成评价文艺作品的重要标准,上述这些经典作品都未能幸免如此“审查”。

在互联网加持下的快销时代,很多人似乎没有太多耐心品读经典,细细体会作者与批评家们的千锤百炼。于是,热热闹闹的弹幕、快节奏的观点反馈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标签化的“三观式评价法”的盛行。似乎掌握了这个“法门”,世界一下子从复杂、多元,简化成了好与坏、是与非。

不可否认,有些“三观评判”是社会生活中主流认同的价值取向,但并不适合作为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因为它很容易让观众、读者受到标签的引导,

在欣赏、判断文艺作品时有了预设立场,戴上有色眼镜。依循标签评判文艺作品,在“三观”上寻找大众认同,实际上是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机会,丢掉了和作者进行心灵交流的乐趣。

而且,多数情况下,当人们用简单的“三观”审视文艺作品时,评论者是在用现代人的思维与标准衡量古人,完全无视历史背景与时代发展进程,结论自然而然地可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譬如包法利夫人,作者福楼拜透过该角色描写了一幕时代悲剧,深刻揭露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这样立体、深刻的角色,绝不是“爱慕虚荣白富美”的

标签所能容纳。

这种碎片化、去中心化传播模式的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作者的创作专注力。现在的网络文学界盛行一种做法:很多作者干脆在文章前注明主角的标签属性,并声明“本文三观绝对正”。一方面,作者主动放弃了对文章思想性的探索,难以创作出高水准的作品;另一方面,标签化的文艺批评,也很难对文学实践本身产生积极的影响。

由此看来,标签化的文艺批评只会矮化文艺作品的内在价值,将世界扁平化、简单化。而真实的世界,绝不只是这个样子。

■ 科林碎玉

孤独的彭罗斯

李 泳

2002年1月,剑桥大学为霍金办60岁纪念会,在他的大照片下引用了湖畔诗人华兹华斯《前奏》里的一句诗:一颗心,永远孤独航行在奇异的海洋。霍金的孤独似乎只是身体的孤立,思想并不孤独,他的小船后面跟着好多股“黑洞潮”呢。其实,这句诗更适合他的老朋友彭罗斯。彭罗斯年近90了,读他近年的书,常感觉他在“自说自话”,话的背后是一个孤独的身影。在霍金那个热闹的生日会上,彭罗斯报告说弦论的额外空间维是不稳定的。第二天有人向他提问,然后就没反响了。萨金在演讲后的午餐时对他说过一句话,也许代表了大伙儿的心声:“当然,你是完全正确的,却彻底迷失了方向!”意思是,您老就算对了,也和我们的路不同。

彭罗斯不仅质疑额外的空间维,他的数学“鹰眼”看很多概念都有问题,如弦论的有限性、宇宙的暴涨、量子引力、早期宇宙的对称破缺、大爆炸与黑洞的奇点……遗憾的是,这些问题“文献里未见讨论”(这是他常说的话)。他自解,那可能是人们不想为数学细节浪费时间,为琐碎的问题分心。传说诺奖得主格罗斯说过,就算有人拿出弦论有限性的数学证明,他也不会去看。这在数学驱动的理论中,确实有点儿奇怪。

他还怀疑标准的时空,认为即使在公认的最小时空尺度普朗克尺度以上(如基本粒子乃至原子的尺度),也该出现新的时空图景。他从薛定谔方程的虚数想到量子时空几何也该是复数的,又发现爱因斯坦方程的真空解背后藏着全纯结构,于是他想全纯的扭量应该是时空的最基本结构,而我们生活的时空只是“扭量全纯实在”的次级结构。简单说,扭量空间是光线的空间,时空的光线是扭量空间中的点,而时空的点在其中变成一个黎曼球。“扭量”是彭罗斯30多年前提出的,更早可追溯到50多年前。扭量不是专门为了统一量子论与引力论,但它自然具备了那样的“潜质”。有趣的是,扭量的数学影响大,物理响应却不多。“圈量子”专家 Rovelli 在2004年考察了上年度的量子引力论文,扭量的只有一篇。不过别人怎么想,彭罗斯几十年一贯地相信他的扭量,如他自己说的,很少有人怀有他那么潇洒的数学态度。

彭罗斯对几何有着异乎寻常的直觉和自觉。他从小就对“不可能”的东西感兴趣。假如有什么东西看似不可能,那一定有更深层的东西。在剑桥读书时,他去阿姆斯特丹开数学会,看见了埃舍尔的画,激发了他的“不可能三角”,甚至还去研究不可能图形的上同调——当然大众熟悉的是埃舍尔反过来又在它的激发下画了《瀑布》。埃舍尔的另一幅“不可能”的《升与降》,则是根据彭罗父亲的“不可能楼梯”画的。他的时空图和奇点定理不过是其几何“意识流”里的两朵浪花。

彭罗斯最近“浪”出一朵大花是一幅“循环宇宙”图——正名“共形循环宇宙学”(CCC),其渊源是外尔曲率。外尔曲率是一个有趣的量,我们熟悉的黎曼曲率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里奇张量写物质,另一部分即外尔张量,写虚空的潮汐。在纪念爱因斯坦百年时,彭罗斯提出外尔曲率猜想,大概意思说宇宙初始的外尔曲率等于零。然后,随着引力的吸积,局部的曲率增大,当引力坍塌成黑洞时,外尔曲率变得无限大。于是,外尔曲率联系着宇宙的始与终。彭罗斯更大胆地猜想,它描述了一个无限循环的宇宙:从大爆炸开始,终结于一个加速膨胀的时空,而这个时空的大爆炸又开启一个新的世代……我们生在无限多个世代中的一个,我们的大爆炸是“前世”遥远未来的延续。前一个世代的共形无限光滑延拓为下一个世代的大爆炸。因为无质量场的爱因斯坦方程是共形不变的,无质量粒子这个“垂死的”宇宙中的观测者“感觉”不到大爆炸的奇点,可以悠然走进新的宇宙,重新捡起一个共形因子,进入演化的“宇宙新世代”。CCC预言,每一次黑洞相遇都会在大爆炸的微波背景(CMB)留下一个圆圈痕迹,而彭罗斯真的在最近观测的CMB中找出了那样的圆圈儿。这里的数学背景是,弯曲扭量空间恰好是真空爱因斯坦方程的一个解——反自对偶解,而它的曲率就是外尔曲率。看来,彭罗斯对外尔的钟情还是因为他的扭量。从这个疯狂的宇宙图景我们看到,彭罗斯几十年来来的时空思索都汇集到一起来了,而且自然解释了一系列的现象和问题,如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和黑洞奇点、暗物质、静止质量、宇宙暴胀等等。

彭罗斯说物理有两种文化,一是弦论及其前辈量子论代表的文化,是计算的文化;一是相对论的文化,是原理的文化。他不信“量子化引力”,而是想着用新的时空图景与量子论的概念统一起来。他做什么,没有同伴们那么明确的动机和目标——如量子引力的,就是想着用量子的方法统一相对论。他的行动源于数学的直觉,也源于他对物理概念的忧虑。所以他从最基本的概念出发,一路走下来,在扭量空间里孤独航行几十年,走出一个新的宇宙来。尽管他的物理图景存在缺陷,他的孤独身影却鲜明映照了当今物理时尚的缺陷。

如果你也爱这片星空

■ 字里行间

雅 倩

人类对星空的好奇与迷恋,大概源于一种最初的本能。记得,女儿一岁多,刚刚牙牙学语的时候,每天晚上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让我抱着她看月亮,而“月”也成了她除了“妈妈”之外最先学会的词语之一。

每当夜幕降临,我们头顶这片天空中的繁星与明月总是格外耀眼。我相信,每个人在儿时都会对星空产生莫大的好奇,只是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这样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被我们渐渐遗忘。但总有一些人,他们自始至终保持了这份好奇与热忱,成为天文学家,或是天体物理学家,在人类探索宇宙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他们的研究成果,或许不能对当下你我的生活产生即刻影响,却可以在漫长的岁月中,带领人类走向广袤宇宙的更深处。

我也算是一名小小的天文爱好者。儿时关于天文学的知识来源很少,一本《十万个为什么·天文卷》早已被我翻看得十分破旧。只是那时我还不知道,在英国,有一群科学家,从1825年就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皇家科学院圣诞科学讲座,其中包含了13场与宇宙时空有关的天文学讲演。近200年后,这些讲演的内容,被整理集结成了《13次时空穿梭之旅》。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圣诞科学讲座的存在。然而,“对于很多英国人来说,皇家科学院的圣诞讲座不过是节假日安排中的一部分,就跟肉馅饼和火鸡差不多”。从1825年起,除了1939—1942年因战争中断,该讲座从未间断。1966年讲座开始在电视上直播,如今我们能在皇家科学院网站上在线观看。如何进行科普,圣诞讲座显然是很好的借鉴。

在这13篇关于天文学的讲座中,第一场

是1881年罗伯特·斯塔威尔·鲍尔爵士关于太阳、月亮及行星的讲座。鲍尔爵士讲的有关太阳系的知识,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都很基础,但在1881年,这些知识被传播给广大民众,还是吸引了众多好奇的目光。鲍尔爵士除了是一位天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位勤奋的科普工作者。据估计,他在1875—1910年间共作了2500场演讲,首次圣诞讲座就非常受欢迎,以至于他在1887、1892、1898和1900年四次被邀请担任圣诞讲座的主讲人。

13场演讲,涉及“陨星”“穿越时空”“宇宙的起源”等话题,这些知识都以一种相对通俗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因此,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本书并不会有阅读障碍,甚至对于有一定天文基础的孩子来说,也是可以看懂。

除了天文学知识,这本书让我看到,在将近200年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是怎样一步步探索宇宙,怎样把对宇宙奥秘的探索传递给更多的人。在每一次演讲中,科学家与现场观众的互动都让我感触颇深。例如,在1885年杜瓦爵士关于“一颗陨星的故事”,讲述的是关于陨星的内容,在讲座结束的时候,每一位在场的孩子都得到了杜尔姆萨陨石上切出的一颗小颗粒和一本小册子,其中包含了一段戏剧性的解释,告诉大家一颗太空岩石从天而降时所发生的一切。我能想象在捡到陨星颗粒的孩子会有多兴奋,这小小的颗粒也许会成为他们珍藏一生的礼物。

我不知道在这近200年的时间里,有多少孩子会因为参加或者收看圣诞讲座而爱上科学,在长大后真的走上科研之路。但即便是没有人真的因此成为科学家,这些讲座也会为他们年轻的心灵推开一扇窗。其实,对于科学的追求,也是我们的“诗和远方”。

如果你也爱着这片星空,不妨跟随这本书体验一次跨越200年的时空探索之旅吧。

■ 摄手作

暮归

(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张义摄

他们的精神

不唱高调的叶企孙

23位受国家表彰的“两弹一星”科技功臣中,有近半是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

胡一峰

今年是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诞辰120周年,他曾经任教的清华大学举行了纪念活动,并举办了专题展。展览名为“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我以为,这个名字起得十分贴切。确实,不论治学治校、育人为人,叶企孙都是一位不唱高调、不虚荣的人。正如当年听过叶企孙讲课的杨振宁所言,“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叶企孙老师在系里、学校里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可是他不大显露出来,很低调。”

叶企孙原名叶鸿胥,号企孙,1898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1913年入清华,1918年赴美

留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次年回国,先在东南大学后到清华大学任教。早在清华上学期间,叶企孙在学校图书馆读到从美国寄来的《科学》创刊号,深受触动。他在日记中写道:“吾人不好科学而不知20世纪之文明皆科学家之赐也!”为此,叶企孙和几个同学一起创办了清华学生科学社,并拟定了章程,提出“本社宗旨在集合同学借课余之暇研究实用科学”,社员应该做到:“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从这“约法六章”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叶企孙务实的作风。

这种作风在他担任教师并主持教学工作后,转化为影响更加深远的一系列办学举措。1926年,

叶企孙受命执掌刚成立的物理系,1929年,他又出任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提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须两者并重。纯粹科学的目标,应着重在养成对于研究的兴趣;应用科学方面,则应明定目标,切实去做。”作为清华大学物理系乃至我国物理学领域宗师级的人物,叶企孙十分重视实验室、仪器和设备对于物理研究与教学的意义。

在一次演讲中,他批评当时国内的师范教育“成绩非常的坏”,“出来的学生,连极根本的、极浅近的科学原理,还弄不清楚。”又因为师范办不好,中学的教育质量也上不去。而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实验仪器,“有的学校没有仪器,仍勉强教科学。其实,没有仪器,就不必教科学。因为教了半天,学生亦是莫名其妙。不如去学旁的东西去,或者有益得多”。而这些没有受过使用仪器训练的学生到了大学,又不知该如何利用大学的科学实验设备。用叶企孙的话来说,“自然科学以实验为基础。学生在中学时代即应对于实验方面得一良好之初步训练,倘徒恃课本,则既不能引起学生对于科学之兴趣,又不能使学生对于基本概念得一真切之了解;与其徒设此科,实不如暂缺之为愈。”

为此,他特别注重在实验室里培养学生,相应地也就注重实验室和设备建设。他主政期间的清华物理系,不但有多所实验室,而且还有金工和木工场,可以修理及制造仪器,在国内首屈一指。1929年1月,吴有训在中国科学社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赞扬道,“中国现在的物理实验室可以讲述者唯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而已。然此三校则以清华为第一。此非特吹,乃事实。盖叶先生素来不好宣传,但求实际。”

而叶企孙这样做,正是为了矫正当时国内科学教育从讲义到书本,从概念到理论的弊端,改变高谈阔论、凌空蹈虚的学风。1932年叶企孙在《清华暑期周刊》上介绍物理系概况时特意提出,“本系之最浅至最深之课程,均注重于解决问题及实验工作,力矫现时高调及虚空之弊”。物理学家李政道的一个例子为此作了很好的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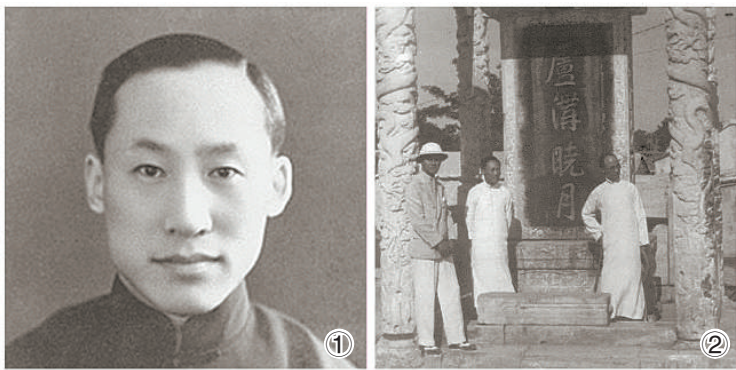
李政道上学时就表现出卓越的才华,叶企孙允许他可以不去听课,但实验必须做。在之后的一次电磁学考试中,信心满满的李政道只得了83分。叶企孙告诉他,“你的理论成绩几乎得了满分,但实验成绩拖了总分的后腿。如果实验不行,理论分数永远不可能得满分。”此事影响了李政道一生的治学理念。

为了培养人才,叶企孙摒弃门户之见,广延名师,建设了一支强大的教授队伍,他曾对毕业生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我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在他的倡导下,各位老师教学与科研并重,一时间,亲自动手在实验中求知做法,在师生之中蔚然成风。

在这样的理念和环境下,叶企孙门下桃李花开,硕果累累。仅以清华物理系第一级毕业生而言,不少成了当时各大学里物理学科的带头人,如施士元、周同庆、王淦昌等,这一点,叶企孙自己也颇感欣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第一届数理化学部委员中,清华毕业生超过一半,其中大部分毕业于叶企孙创办的理学院。1999年,国家对当年研制“两弹一星”中有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细心者发现,其中差不多一半的人是叶企孙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

叶企孙留下的文字并不多,除去科学研究的内容就更少。这或许也与他寡言少语、不尚空言的性格有关。不过,在这不多的文字中,我们却可以看到:“有人怀疑中华民族不适合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唯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科学研究,50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今天,距离叶企孙说这些话已经过去了将近90年,但重读这掷地有声的话,以及叶企孙不唱高调的品格,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图① 叶企孙像
图② 与陈岱孙和吴宓于卢沟桥。

图③ 1948年春,叶企孙(左)到国学大师陈寅恪(右)家做客。



扫一扫
欢迎关注
嫦娥的秘密
微信公众号

